

# 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史学的性质和地位

赖元晋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4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风靡欧美,渗入到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和几乎一切人文学科,同时也形成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这种史学的特征,概括一句话,就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抗。它表现在:理性主义者鄙视中世纪,浪漫主义者却将中世纪理想化;理性主义者相信世界普遍一致的人性,注重世界通史的写作,浪漫主义者却鼓吹民族精神和民族性,专注于写作民族史、国别史;前者崇尚理性的认识能力,重在对历史进行冷静的哲理分析,后者却崇尚直觉和热情,重在对历史情景作形象描绘以抒发个人的激情。

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武器之一,具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史学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呢?其历史地位如何呢?国外学者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对我国较有影响的看法则是解放初被译为中文的苏联教材《中世纪史》(谢苗诺夫著)绪论中的一句否定性评语<sup>①</sup>。这种看法在苏联曾长期流行,阿尔巴托夫在《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更明确地把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看作资产阶级思想与反动贵族思想的对立,并断言:“史学中的浪漫主义乃是在思想上摧毁法国革命的一种意图。”<sup>②</sup>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也持类似看法,他在《史学著述史》一书中写道:“历史著述中的浪漫主义意味着蒙昧主义的一次决定性倒退,而这种倒退是同柏克、麦斯特和波拉尔所代表的反动社会政治哲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sup>③</sup>总之,他们认为浪漫主义史学是反动贵族性的史学,其地位则是造成西方史学的严重倒退,本文就浪漫主义史学谈谈一点不同看法。

认定浪漫主义史学具有反动贵族性质、旨在摧毁法国革命,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浪漫派史学最盛行时期是神圣同盟的反动年代。一些反动学者确实是出于对法国革命的仇恨而举起浪漫主义旗帜。早在1790年,英国保守政治思想家柏克发表《法国革命感言》,肆意诽谤法国革命,倡议进行国际武装干涉,同时提出反动浪漫主义的国家历史理论,强调国家是历史形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代人的“合伙事业”,不能以“颠覆方式”进行改革,鼓吹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绝不能模仿外国的例子(指法国)随意改变现存制度,鼓吹神意是一切法律的法律。柏克因此受到各国反动派的推崇,被誉为“浪漫主义的精神之父”<sup>④</sup>。接着,法国逃亡贵族夏托布里昂在1797年发表《论革命》,攻击法国革命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在19世纪初,他又发表了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精神》和《殉道者》,将中世纪基督教和社会生活描绘得五彩缤纷,令人神往,在文史界掀起一股颂古非今的复古和宗教思潮。随着1815年拿破仑的垮台,这种反动思想蔓延欧洲各国,形成各种反动浪漫主义史学流派,如德国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法国复辟时期贵族官方史学、俄国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

这些流派热衷于写作中世纪史,用理想化了的封建秩序来攻击法国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法国贵族史家蒙洛日耶甚至公然称“奴役制是一切民族的自然秩序”,“人身不平

等是永恒的自然不平等”<sup>⑤</sup>。俄国正统学派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中宣传专制制度永远是俄国历史的核心和基础，没有沙皇制度就没有俄罗斯。这个学派特别鼓吹俄国人民具有“宗教虔诚、忠君保皇、温良恭顺”的民族性和俄国人民与沙皇利益完全一致的“正统民族性”理论。耶拿学派历史家则竭力颂扬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生活，鼓吹君主制是最优秀的政治制度。

这种流派的历史学家以信仰至上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对“民族精神”作神秘主义解释，把它说成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攻击理性主义者的反宗教宣传，美化中古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理论。英国的许多教会史著作把教会说成公民自由的保卫者，耶拿学派的施雷格勒和列昂把天主教写成世界历史的核心，攻击宗教改革造成社会倒退。这一派史学与同期兴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彼此呼应，成为神圣同盟反动体系的两大思想武器。

这个流派出于反革命目的而提倡历史主义和历史有机发展的思想。“法的历史学派”领袖萨维尼在《法的历史杂志》创刊词中写道：“每个时代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每个时代都以不可解开的纽带与过去紧密相连，因此每个时代都得承受某些前在的因素。这是必然的又是自愿的。所谓必然，就是说每个时代的行动都不依附现在的意志和判断；所谓自愿，就是说它们的行动不是外来意志所强加，而是由……整个民族本性所赋予。”<sup>⑥</sup>萨维尼这段名言就是反动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理论概括。他用所谓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反对任何进步的社会变革，用所谓“前在因素”否定人们的历史能动作用，借口反对“外来意志”反对效法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尊重历史的幌子下为历史上一切丑恶现象进行辩护；其政治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谢苗诺夫等人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否定性评价对于这些反动浪漫主义者来说，倒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用这类评语来概括整个西方浪漫主义史学就很难令人心服了。

首先，浪漫主义历史思想并不是法国革命后才出现的。早在启蒙运动以前，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在《论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中就系统提出浪漫主义的历史连续性思想。如果说维科的著作在19世纪20年代前还不为欧洲史学界所了解，我们姑且不谈，那么，卢梭著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想却是当代和后代学者所尽知的。他的思想与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伏尔泰歌颂近代文明而否定过去，卢梭却颂扬原始“自然状态”而否定近代文明；伏尔泰批判封建的政治不平等，卢梭却大胆揭露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伏尔泰用“理性的迷误”解释不平等的产生，卢梭则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不平等的根源；伏尔泰对不平等现象作绝对的否定，卢梭却认为不平等的产生既是一个退步又是一个进步，表现出与理性主义格格不入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萌芽；伏尔泰乐观地相信人类社会能无止境地趋于完美，卢梭却悲观地认为人类已处于无可挽回的衰老状态。总之与伏尔泰不同，卢梭思想中贯穿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出自封建贵族的反动立场，而是反映广大小生产者的愿望。他同时也批判（而且比伏尔泰更尖锐）封建制度，并直接诉诸人民革命来消灭封建暴政。这样，浪漫主义奠基者卢梭便成为启蒙运动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代表。

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很快在欧洲、尤其在德国产生强烈反响。康德在他的影响下提出类似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的因果性就是遵循一定法则的连续性。康德的学生赫德尔在《另一种历史哲学》（1774）中公开批评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忽视民族历史特性和爱用绝对标准评价历史<sup>⑦</sup>。后来，他在《人类历史哲学概论》中（1781—1791）系统提出了浪漫主义历史理论，强调每个历史阶段都是总的历史链条中的必要环节，强调各民族天生具有不同的体质和精神特征，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sup>⑧</sup>。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就是

在赫德尔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而无论是康德、赫德尔还是其他带有浪漫主义思想的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几乎都反对德国封建制度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制度，要求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他们都欢呼法国革命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希望在德国建立类似法国的资产阶级制度。

可见，浪漫主义最初是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奠基者们同时又是反封建的斗士。这是我们讨论浪漫主义史学的性质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这说明，从其起源来看，我们就不能把浪漫主义称为反动贵族思想。

当然，浪漫主义思想是在法国革命后才取代理性主义而控制西方史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变化仅仅看作是法国革命激起的贵族思想反动的产物。实际上，我们从法国革命中可找到浪漫主义迅猛发展的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法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粉碎了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对现实深感绝望的群众普遍产生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厌恶，同时又泛起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心情。资产阶级出于对雅各宾专政的仇视也厌恶理性主义的民主思想。大革命中过火的反天主教运动反而激起落后群众的宗教情绪。这一切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其次，从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开始的、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全欧的长期战争，造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强烈的民族感情代替了18世纪流行的世界主义，这就使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观念得以取代理性主义者宣传的世界一致人性的观念。

最后，法国革命的瞬息万变的过程和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也促使人们思想方法的改变。理性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缺乏历史感，这与18世纪社会发展比较平缓有关。法国革命却大大加快历史发展速度，一代人时间内便消灭了千年封建制度，而使整个欧洲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历史家们第一次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体验到什么是历史的发展和联系，这是18世纪思想家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正如梯叶里所写：“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sup>⑨</sup>这就促使思想家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重视对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

可见，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迅猛，席卷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因为它适应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有广泛社会基础，而决不是一小撮反动贵族文人所能做到的。反动贵族的确利用浪漫主义来美化中世纪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形式下表达他们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愤慨情绪，形成小资产阶级进步浪漫主义史学。

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历史著作（如法国的密席勒、德国的威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等的著作）反映劳动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对资本主义丑恶现实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强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找不到改变现状的正确道路，便寄希望于恢复中古宗法生活，将中世纪理想化。但是，他们所歌颂的不是封建帝王贵族，而是中世纪的人民（实为理想化的小生产者）。他们着力表现人民的生活、情操和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塑造出他们心中的人民英雄的高大形象（如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观，要求写作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密席勒认为，在中古法国，只有人民才保持了自然的美，只有人民才具有对祖国对故乡的天然的爱，才具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尽管这种流派著作中存在颂古非今倾向，但绝不能把它归于反动贵族史学。相反，他们对封建专制和贵族专横的批判比自由资产阶级史学家更猛烈。德国威美尔曼在《伟大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就

激烈抨击德国贵族和僧侣压迫农民的罪行，歌颂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批判路德的背叛。不过，这派历史家仍然跳不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范畴，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翼。某些历史家（如卡莱尔）最后还倒向英国统治阶级的怀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自由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史学。

浪漫主义思想一开始便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是与自由资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但是，由于他们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和思想方法已不适于自己的需要，对浪漫主义思想中的个性解放和极端主观性又感到相当合拍。因此，他们也接受了浪漫主义，形成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流派。

在这个流派身上，“对理性主义的反抗”具有与反动流派完全不同的政治内容。他们反抗的并不是理性主义者的反封建精神，而主要是否定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治史方法。他们接受历史主义，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程度不同地将中世纪理想化。但是，他们歌颂中世纪绝不是要美化和恢复封建制度，而是把中世纪看作第三等级和近代制度的萌芽、形成时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这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个流派的杰出代表梯叶里便坦率承认，他之研究中世纪史，“不过是为我们中等阶级和下层阶级、为第三等级的祖先、为这些被现代历史家所忘却的忠义之士恢复名誉。我出身平民，我要使他们在我国编年史中占据光荣的地位；要使传统的平民荣誉感和热情，使资产阶级的自由获得应有的尊敬。”<sup>⑩</sup>因此，他们在中世纪史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与反动浪漫主义流派针锋相对的观点。

例如，法国贵族史学家鼓吹法兰西起源的日耳曼论，认为法国是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因此作为日耳曼人的后裔的贵族便享有统治国家、占有土地的历史权利。梯叶里等自由主义史学家则鼓吹罗马论，认为法国起源于古代罗马制度，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真正起源者，而第三等级则是他们的后裔，所以理应是法国的主人，法国历史应该是第三等级的历史。贵族史学家攻击中世纪城市自治运动是对贵族特权的非法篡夺，梯叶里则把城市自治歌颂为“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现代自由的摇篮”<sup>⑪</sup>，认为法国革命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和最高发展。又如，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格拉诺夫斯基针对正统学派美化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观点，抨击俄国封建秩序实为贵族的为所欲为。他将农奴一概称为“奴隶”，并将中世纪等级君主制描绘成近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sup>⑫</sup>。这些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主观想像来写中世纪史，将中世纪的第三等级理想化，为近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寻找历史的根据。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非常重视研究近代史、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史。这类著作作为数很多，虽然其中一些作者如马考莱、基佐、米涅等并非浪漫主义者，但这些人也都在不同方面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都接受历史主义思想。这类著作都旨在赞扬资产阶级革命和驳斥反动派对革命的诬蔑。例如，法国的德·斯退尔夫人在《法国革命论》中着意颂扬“1789年精神”，拉马丁著《吉伦特史》赞扬吉伦特派的共和主义，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欢呼“法国革命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sup>⑬</sup>。英国辉格学派领袖马考莱在著名的《论弥尔顿》中称赞英国革命“宣布了一些非凡的原则，这些原则在美洲的密林深处为自己开拓道路，使希腊人奋起挣脱两千年来的奴役和屈辱，并在欧洲每个角落点燃被压迫者心中的无法扑灭的火焰而使压迫者胆颤心惊。”<sup>⑭</sup>德国自由主义的海德堡学派领袖施洛塞尔在《18世纪史》中将法国革命造成的社会进步与德国的反动落后状态作对比。这些著作都带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不过它们着重在歌颂革命中的温和派，抨击革命中的民主派及其“过激行为”。

与反动史学家鼓吹的今不如昔的悲观主义思想相反，自由派史学家继承了理性主义的历

史前进性思想,把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看成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马考莱在《英国史》中把从1215年大宪章、1640年革命到1832年国会改革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一场伟大革命的不同阶段。格拉诺夫斯基自信地指出:“人类的前进运动是无可置疑的,历史过程就是新陈代谢。”<sup>⑮</sup>德国海德堡学派代表格尔维鲁斯在《维也纳条约以来的十九世纪史》中指出:“最近三、四百年的历史尽管有种种阻碍和曲折,却是一直朝着从个人解放到群众解放的方向发展。”<sup>⑯</sup>这些乐观进取的言语都表现出19世纪前半期自由资产阶级对本阶级的事业的必胜信心。

自由派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重视民族史,歌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与反动浪漫主义鼓吹的那种对外征服的或农奴对贵族温良恭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不同,他们赞扬的是被征服者抵抗征服者(高卢人抵抗日耳曼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抵抗诺曼人,等等)和第三等级反抗贵族统治的“自由精神”,反动史学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讨业绩、贵族生活和情趣作为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自由派史学家则把第三等级看作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梯叶里甚至将“民族”与“第三等级”划等号,认为第三等级构成法兰西民族,僧侣和贵族则是民族的外来压迫者。格尔维鲁斯著《德意志诗歌文学史》将席勒、歌德的作品作为德意志民族诗歌文学的代表,用民族诗歌的成就鼓舞民族精神,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政治民主化的任务。

这个流派的历史学家也赞扬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宣扬神意,将本民族说成神赐的优越民族。但是,与反动流派不同,他们并不想恢复中古教会的统治,而着重于赞扬新教在近代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为资产阶级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宣传资产阶级的种族优越论。

自由主义流派与反动流派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反动流派在宣传历史主义时,把历史说成完全由“前在因素”和“民族本性”决定的无意识过程,人们在它们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自由主义流派在接受历史主义时却承认人的历史能动作用。法国复辟时期自由主义史学家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说明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其中,被马克思称为“法国史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sup>⑰</sup>的梯叶里,首先把中世纪史写成第三等级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基佐、米涅和梯也尔还将阶级斗争思想运用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他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存在许多严重缺陷,但毕竟是19世纪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中的重大成就。

以上说明,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但内部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历史观点可大不相同,以至针锋相对。反动流派在神圣同盟反动年代虽嚣张一时,但只是在德国和俄国等经济落后、资产阶级非常软弱的国家统治史坛,而在西欧和北美各国,自由主义流派却占据了史坛主导地位。在复辟时期的法国,贵族史学尽管有政府为后台,仍然在同自由主义流派的激烈论战中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主义辉格学派战胜了保守的托利学派,开始了辉格学派长期支配英国史坛的局面。美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则完全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令在德国和俄国,反动史学流派也受到自由主义流派和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批判。至于1830年以后,反动流派更是一蹶不振。在这以后的西方浪漫主义史学主要是自由主义流派和小资产阶级流派两家了。把西方浪漫主义史学统统称为反动贵族思想的观点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这种史学内部不同流派的存在,尤其没有考虑到自由资产阶级流派的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西方的反动浪漫主义史学也不全然是贵族史学。严格说来,只有法国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反动浪漫主义者才代表落后贵族的利益,旨在为复辟封建制度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反动历史学家如柏克和托利学派之恶毒攻击法国革命,却不是要恢复中世纪

封建制度，而是为了维护英国的保守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现存统治和维持其海上霸权地位。柏克本人政治上还属于辉格党，赞扬1688年“光荣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文件《权利宣言》，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说明英国反动浪漫主义史学主要是代表英国保守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他们力图与封建的欧洲君主国相勾结，共同反对法国革命，因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德国反动浪漫主义者也与法国的不同，他们几乎全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欢迎法国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由于法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国，他们才转而仇视法国革命。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害怕任何进步的社会变革；他们本不想退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在旧制度、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社会的楷模；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在反动贵族领导下实现他们的空想，结果却成了反动派的帮凶。德国反动浪漫主义就是当时保守的、软弱的德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而到19世纪60年代，那里的最后一批反动浪漫主义者（如列奥、吉西勃莱世特）都溶合到资产阶级的朗克学派、普鲁士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中去了。

至此，我们可以结束对浪漫主义史学的阶级属性的讨论了。结论是：浪漫主义不是某一个阶级特有的意识，而是在19世纪初几乎一切阶级身上都有所表现的一种时代精神，不同阶级都用它来表达自己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对它的阶级属性作出准确的规定。但是，由于这种时代精神所产生的时代是欧洲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的时代，由于浪漫主义历史思想最初是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而且在这种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流派，其他各种流派或被它战败或被溶合于自由主义中去，所以我们也不妨把它大体上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史学，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那么，浪漫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居于什么地位？它是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还是象巴恩斯说的那样，造成西方史学的“一次决定性倒退”呢？这个问题如同浪漫主义史学阶级属性问题一样，十分复杂。

应该承认，在一些方面，浪漫主义史学较之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确实倒退了一大步。首先，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对教会统治、宗教迷信和神学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西方史学世俗化过程推向高潮。浪漫主义不同流派却大都带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神学观念，造成社会上宗教思想的回潮，而且打断了史学世俗化过程，直到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之后情况才发生明显变化。第二、理性主义史学家批判以往的编年史以帝王为中心，主张写普通人的历史，写人类史、文化史，即把整个社会活动的各方面都纳入记史范围。他们批判以往的历史单纯罗列事件和人物，主张对历史进行批判的思考，找出事件的因果联系，揭示历史的规律，第一次提出研究历史哲学的任务。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却夸大伟大人物的作用，热衷于描述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历史情节，不屑于对整个历史过程进行冷静分析，将理性主义提出的写文化史和人类史的主张束之高阁。他们鼓吹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个体，否认世界历史的共性，否认历史规律性，蔑视历史哲学。第三、理性主义历史学家在世界人性一致的思想指导下，试图建立包括东方民族在内的世界史体系，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却只是歌颂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开始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完全漠视东方各国的历史。在这些方面，它们对以后西方史学产生很大消极影响。

但是，如果仅根据这些就完全否定浪漫主义史学的积极作用，则未免过于片面。它的积极作用表现在：首先，浪漫主义史学家第一次把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提到首位，各国都争相写作本国史，尤其是长期被忽视的中世纪史，这就使历史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历史著作显著增加。他们虽然忽视世界史，但这种国别史研究的普遍开展却为以后产生更充实的

世界史打下基础。其次，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善于描写具体历史情景和中古田园风光，运用抒情的文学笔法，从而吸引了广大读者，促使了历史著作的普及，激起人民对历史的广泛兴趣，改变了以往的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阅读的状况，为史学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第三，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直觉，不重视史料工作，史实准确性很低，但是民族史研究却又促使欧洲各国普遍开始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资料。而且浪漫主义者把语言当作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掀起研究语言的热潮，从而产生了近代语言学，促使把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订，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史科学的产生。

浪漫主义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浪漫主义者提出的历史主义原则。几年前，我国史学界有人为划清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界线，将19世纪初的历史主义称为保守的、反动的、反科学的思想，称为反动贵族反对法国革命的思想武器<sup>⑩</sup>。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浪漫主义史学之罪过大矣！

19世纪初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确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这种历史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被看成精神的发展过程，这种历史主义是以生物机体的生长老死过程解释社会历史，强调历史连续性而否认历史中存在飞跃和突变，而且反动浪漫主义者只是在研究中世纪史时强调这一原则，却拒绝用同一原则看待法国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他们将中世纪理想化实际上又是反历史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科学原则相比，这种历史主义的确显得很幼稚，远非真正的科学原则。然而，我们却不能将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作为评价19世纪初的历史主义的标准，而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这种历史主义原则，即应把它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放在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

近代西方史学，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迄至18世纪末，成就不小。但是在这几百年间，史学仍远远落后于其他人文学科，历史著作几乎完全是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教会人士的业余之作，历史仅仅被看成是文学的分支、哲学的注释、政治家们以史论政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研究的题材无非是古代希腊罗马、基督教会和文艺复兴以来若干重大事件，人们对本民族历史都没有连贯的了解，对漫长的中世纪史更是一团漆黑。18世纪理性主义虽然在奠定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方面成就不小，但这些历史学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不懂得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历史，往往把某些事件和人物从总的历史联系中人为地抽出来，然后根据某些固定不变的现代标准加以褒贬，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中世纪的态度上。他们出于对封建制度的义愤，把中世纪称为“狼与熊争吵”的时期（伏尔泰语），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千年空白”（休谟语），认为中世纪根本没有什么文明历史可言，不值得人们去研究。他们虽然提倡历史前进性思想，却把历史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断历史、否定历史的思想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反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sup>⑪</sup>这样，非历史主义思想成了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阻碍，不冲破它就不能形成独立的历史学科。

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按照这种历史主义，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存在不可割断的连续性，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

的，因此，对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其起源，具体了解其各个发展阶段，承认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加以绝对否定。按照这种历史主义，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历史模式取代各民族具体的历史。这种历史主义不管有多少缺陷，仍然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思想方法的一次巨大进步，一次飞跃，对历史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正是从19世纪初起，西方史学开始起飞，不仅形成有自身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不仅迅速赶上其他人文学科，而且跃居诸人文学科之首位，被整个学术界公认为“科学的皇后”，19世纪也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当然，这个时期推动西方史学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历史主义思想广泛运用，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内在因素。历史主义思想还使得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们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课题而挣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史学推动其他社会学科的发展，历史主义原则也被公认为一切社会学科的基本原则。

19世纪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虽然有本质区别，但又有继承发展关系。列宁写道：马克思“一方面承受并进一步发展了18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承受和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及辩证法）……”<sup>②⑩</sup>。显然，列宁在这里把19世纪初的历史主义看成人类先进思想成果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前提之一，而没有把它看成某种反科学的思想糟粕。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全面认识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是有指导意义的。

由于提出了历史主义而扫除了史学发展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浪漫主义史学所起的积极作用便远远超过它的消极作用，它迈出19世纪西方史学迅速发展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的基本估计。

#### 注释：

- ① 谢苗诺夫：《世界中纪史》1954年中译本第4页：“19世纪上半期在欧洲各国都有其代表的浪漫派历史家，相反把中世纪看成为与“腐败的”、“文明的”“近代”社会根本相反的理想社会”。
- ②⑥⑩ M·A·阿尔巴托夫：《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政治思想》，莫斯科1949年版，第54、56-57、68页。
- ③ H·E·巴恩斯：《史学著述史》，纽约1963年版，第178页。
- ④ 关于柏克的思想，参见《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⑥ 转引自J·W汤普逊：《历史编纂史》（第2卷），纽约1942年版，第161页。
- ⑦ 参见B·A·哈多克：《历史思想概论》，伦敦1980年版，第96-99页。
- ⑧ 参见汤普逊前引书第135-138页。
- ⑨ A·梯叶里：《法国历史书信集》序。转引自F·斯通编：《史学集锦，从伏尔泰到现代》，纽约1958年版，第66页。
- ⑪ A·梯叶里：《历史研究十年》巴黎1877年版，第11页。转引自阿尔巴托夫前引书，第67页。
- ⑫⑬ 参见M·B·吉霍密诺夫主编：《苏联历史科学史纲》（第1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77-278、318页。
- ⑭ 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中译本，第3页。
- ⑮ Th·B·马考莱：《评论文和历史论文集》，纽约1908年版，第14页。
- ⑯ G·P·古奇：《十九世纪的史学和史学家》，伦敦1920年版，第110页。
- ⑰ 《马克思1854年7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1-382页。
- ⑱ 参见《世界历史》杂志1979年第1期所载《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第5、10页。
- ⑲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 ⑳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7页。